

从理论信仰到革命实践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化演进历程

耿志勇

(唐山学院 宣传部,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率先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化演进历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呈现出从理论信仰到革命实践的历史化轨迹:从理论介绍到接受信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自觉;通过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论战,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通过革命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积极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创者从理论信仰到革命实践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传播;历史化;演进历程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8)04-0016-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8.04.003

From Theoretical Belief to Revolutionary Practic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Li Da zhao's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GENG Zhi-yong

(Department of Publicity, Tangshan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one of Chinese earliest Marxists, who first held up the banner of Marxism in China, start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Marxism disseminatio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Li Dazhao's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from theoretical belief to revolutionary practice: to start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Marxism dissemination from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belief acceptance; to continuously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 and expand its influence through the controversy with non-Marxist thoughts; to complet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a Marxist pioneer from theoretical belief to revolutionary practice through revolutionary practice, persisting in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practicality, exploring the road of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Li Dazhao;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凡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或中共党史的学者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自晚清至民初,各种主义已现萌芽;自新文化运动兴起而至北洋军阀统治

结束,伴随思想解放之潮流,各种主义并立,成为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而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民最终历史地

作者简介:耿志勇(1979—),男,河北滦县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不惟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更通过思想论战,领导、筹划革命团体,创建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运动等实践,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开创者从理论信仰到革命实践的历史使命,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

李大钊投身救国救民事业,最初是以西方民主政治为参照系,抱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坚持不懈地研究和探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追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后来,李大钊又将事业重心转向以改造国民精神为目标的思想启蒙运动。但是,在反动专制的政治与文化中,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难有进展。特别是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等发生在民国的荒谬事件,李大钊逐渐看清了段祺瑞等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对资产阶级立宪政治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的西方帝国的罪行与丑恶,更让李大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有了清醒认识:“西洋文明之精神,对内则恃集中的资本主义以掠夺劳动阶级,对外则恃国民的暴力主义以掠夺他国土地。质言之,西洋之文明,掠夺之文明也;西洋之主义,掠夺之主义也。”^{[1]154}他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的开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借镜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对资本主义救国道路上的失望,李大钊没有“益其愁哀,驱聪悟之才,悲愤以戕厥生”^[2],而是把关注目光更多地转向了谋求挣脱专制官僚统治、建立新型共和国的俄国革命,开始了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而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通过对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进行对比来确定革命的性质、意义和地位,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将来的发展方向:“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

也。”^{[1]330}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预示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对中国有着很大的示范意义,号召国人迎接“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世界的新潮流”^{[1]332}表明李大钊告别法兰西文明,开始转向社会主义。1918年11月、12月,李大钊接连发表题为《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的两次演说,这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李大钊热情歌颂庶民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同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来理解社会问题。在《庶民的胜利》中分析大战原因时指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1]357}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李大钊更加深入、实质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之前表达马克思主义观点开始首次提到马克思并尝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释:“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 Marx 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1]364}坚信由俄国革命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预示着新世纪的发展方向,Bolshevism 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1]357},振臂疾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367}

五四运动后,国际国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政治格局,进步知识分子形成了改造中国社会制度的共识。出于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需要,李大钊在对马克思主义初步研究的基础上,投入更大的精力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考察中国国情,结合国情实际来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评价,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分为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也就是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三者之中,唯物

史观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3]5} 马克思根据其唯物史观确定,生产力是社会组织演变的根本原因,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观察资本主义经济状态,分析和解剖资本主义经济组织,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移入社会主义组织的必然命运,最后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手段是阶级斗争,故而“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3]5}。于是,在介绍唯物史观部分时,李大钊鲜明地指出:“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3]5} 这样李大钊就第一个从哲学、伦理学,从经济与政治互动关系中找到了根本改造中国的新工具、新信念,从而也标志着李大钊信仰的根本转变,他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一旦马克思主义从科学理论上升到信仰被接受,必将开启信仰者的理论自觉,也必将开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境界,从而使李大钊深刻地认识到改造社会、再造中华不能仅仅在思想变化和道德改造的基础上就能完成,思想启蒙必须同社会的改造紧密地结合起来。继《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在一年的时间里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一系列文章,着重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尝试从经济原因论证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社会主义趋势和走向,以此谋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

二

思想启蒙运动在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时展现出强大的思想合力,一旦进入实际政治生活后,新文化运动内部阵营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分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新三民主义、“好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纷纷登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各种主义错综并立,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定荆棘满地、艰难曲折。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辩论,才能开拓前进的道路。针对非议责难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论

调,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给予坚决回应。在“问题与主义”“批驳基尔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划清界限”等三次著名的思想论战中,李大钊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等形式,主动应对各种思潮的挑战,捍卫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认为当时社会上存在空谈主义、高谈主义的弊病,指出空谈主义的缺点和危害,应该“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4]。强调多研究具体问题,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要高谈主义如何新奇、如何奥妙。1919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3]50} 坚信“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3]51}。空谈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而是空谈主义的人造成的。最后,李大钊落实到“根本解决”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3]55}。“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观察中国政治问题得出的重要结论。在我们看来,这次“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身而言,主要是从理论上阐明“主义”与“问题”的相互关系,并没有涉及具体“主义”的价值评判,是一次关于学理问题的讨论,并未上升到意识形态论战。国内的一些研究者称这次论战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论战,是理论上的先入为主。虽然是学理讨论,但绝不能低估这次论战的意义:论战时李大钊还没有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信仰尚未真正形成,而经过这样的论战,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学理上经过历练和检验,从而进一步推动思想上的成熟。

毛泽东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说道:“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5]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应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所鼓吹中国应该走发展事业、兴办教育的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有了充分发展,才能谈得上发展社会主义,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改良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道路的论战。从内容上看,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有无劳动阶级、实行社会主义要不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作前提、能否走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等方面。论战中,李大钊发表了《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等文章,对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反驳。李大钊指出,中国的经济情形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同样受到资本主义压迫和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存在,“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3]359}因此,想实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不仅理论上不可以,而且社会发展趋势也不允许用资本主义办法开发实业,李大钊以苏维埃政府在三年时间内修建铁路、发展农业、迅速振兴实业为例,指出:“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3]353}并预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3]353},这场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乎中国的道路选择,争论的是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李大钊在论战中立场鲜明,坚持中国只能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道路。经过论战更加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心,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理论引入中国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比较流行,影响很大,成立有晦鸣学社、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

社、进化社、奋斗社等众多团体,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有七十余种。当时,以黄凌霜、区声白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和批判专制统治、传播新思潮方面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故而将攻击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由此引发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论战主要围绕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自由和纪律等问题,论战持续一年多时间,激烈程度可见一斑。针对无政府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调,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演讲中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政权的夺取、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三个阶段,政权的夺取有和平的和革命的手段,鉴于平和手段常归于失败,“乃悟改造的事业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6]。针对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自由和纪律问题,李大钊在《自由与秩序》一文中阐明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纪律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指出,个人与社会不是不能相容的,是同一事实的两方面,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通过辩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3]327}这场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关涉到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以及自由和纪律等问题,争论的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以及政权建立的途径和方式等根本问题。经过论战,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逐渐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李大钊作为革命导师,对青年人的这种转变表示热烈欢迎。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也都转变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

经过论战,李大钊在学理探讨、道路选择、政权选择等层面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以及其他流

派社会主义的界限,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了自己的革命道路和革命理想。而论战也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中国革命有了真正科学正确的理论指导,同时壮大了马克思主义队伍,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三

李大钊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后,即以其为指导思想,运用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并注意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和手段问题,努力开辟改造中国社会的现实道路,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从组织社团、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到创建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等一些列实践活动,李大钊不仅展现出革命理论家的气质,更展现出革命实践家的品格,特别是1924年底,李大钊从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归来后,陆续辞去了几个大学的教授职位,集中力量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实际工作,以一名职业革命家的身份投身革命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马克思主义,直至为革命牺牲。

为了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影响,李大钊主办或帮助创办了《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新潮》等报刊,参与和帮助了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曙光社等社团,影响和争取爱国青年,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人都受过他的影响。1920年3月,在李大钊直接领导和筹划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成员大多为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7]。1920年8月,李大钊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参加觉悟社、人道社、曙光社、青年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学会召开“陶然亭五团体会议”,推动五团体“改造联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通过了《改造联合宣

言》和《改造联合约章》两份文件,“主义明确”“旗帜鲜明”等原则为各团体活动提供了行动准则。成立进步社团,指导社团活动,不仅推动青年思想的转变,更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

1920年1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在路上与其协商有关建党的有关事宜,拉开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大幕。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底,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此后,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蓬勃展开,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李大钊开始思考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问题。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性:“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3]349}同时又进一步阐明党的性质:“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3]350}在筹备建党的过程中,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表明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开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

中共一大以后,中共北京支部先后改名为中共北京地委、中共北京区委和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是主要领导人。他一方面推动北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发展北京地区、晋豫陕甘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另一方面,他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工人运动的实践中,组织开展工农运动。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李大钊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指示,推动国共

合作的,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并向全党发出号召:“目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向工农群众说明内战的原因和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斗争的同时,还将组织群众进行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8]1924年1月,李大钊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领导北方工农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面对北洋军阀的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逮捕了李大钊等人。面对反动军阀的淫威,李大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虽然革命遭到严重挫折,但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革命运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李大钊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之后,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过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起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

四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李大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化演进历程。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不断深化、不断前进的历史轨迹:从理论介绍到接受信仰,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开启了信仰者的理论自觉;通过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论战,李大钊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通过投身革命实践,李大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积极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创者从理论信仰到革命实践的历史使命,从而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 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56.
- [3] 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4] 张岂之.民国学案: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333.
- [5]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
- [6] 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65.
- [7]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0.
- [8] 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6.

(责任编辑:夏玉玲)